

亚洲安全形势与亚洲安全观

◎ 钟飞腾

2014年5月21日，在上海举行的亚信（AICA）第四次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亚洲安全观，是新一届领导集体在综合研判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基础上提出的外交新理念，是进一步促进地区融合、构建稳定地区框架的方案，也是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信心的重大举措。

一、当前亚洲安全形势的特点

2014年5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在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我们不惹事，但是也不怕事，我们在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上是坚定不移的，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

亚洲幅员辽阔，人口占全球67%，经济总量占全球1/3，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亚洲安全形势总体上还处于稳定状态，但也发生了急剧变动，呈现出如下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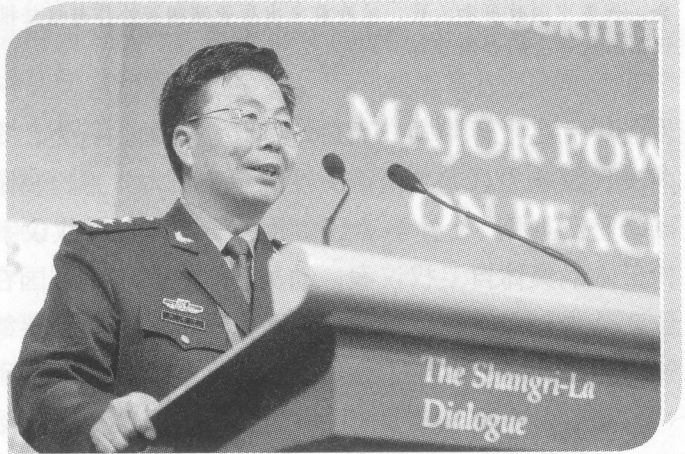
第一，热点问题仍然突出。例如，在东北亚次区域，朝鲜半岛问题长期以来是热点问题，日本与俄罗斯、韩国以及中国在海洋领土问题上纠纷不断，中韩与日本之间的历史问题、慰安妇问题也频繁见诸报章。在东南亚，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

南海声索国的争端尤为突出，因中海油“981”钻井平台开发西沙群岛海域资源引发的纠纷已经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南亚，印度与巴基斯坦长期以来围绕恐怖主义、领土等问题的纷争也一直存在，而阿富汗问题则随着美国2014年撤军显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在中亚地区，相对突出的仍然是“三股势力”，特别是极端宗教势力制造恐怖袭击给人民群众心理、财产和人身安全造成极大损害和威胁。在西亚地区，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危机以及伊拉克重现战火，影响到国际能源市场和武器防扩散机制，也都是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热点问题。

第二，亚洲的海洋问题明显升温。美国主导的西方舆论夸大中国崛起的负面影响，认为中国与邻国的政治安全互信显著降低，个别国家的对冲行为加剧，南海有可能爆发小规模冲突。中国方面则认为，南海地区形势的复杂化，主要源于越南、菲律宾的单方面行为以及域外国家美国、日本的积极介入。由于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越南、菲律宾借势改变其南海政策，成为美国实施平衡中国战略的抓手。而日本因钓鱼岛争端，积极推进集体自卫权，将南海问题看作是突破战后秩序约束的一个重大机会。

第三，亚太地区的军费开支增速明显。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13年亚洲（包括大洋洲）的军费开支为4000亿美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占全球的比重从2000年的18.1%上升到23.5%。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费已经突破占GDP1%的约束，印度7月新出台的国防预算费用较上一年增加12%。美国在整个全球军事体系中处于绝对的压倒地位，军费开支占全球排名前15位的国家总和，尽管在金融危机后由于财务约束而减缓了扩增速度，但美国向亚太地区转移军事力量、增加军备出口的势头却在增长。

第四，中美博弈加剧。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意在避免重蹈“修昔底德陷阱”，防止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重大冲突，建立不同于冷战时代的新型国际关系。但出于维护地区霸权这一首要的战略目标，美国显著地增强了和地区内



2014年6月7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针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美国防长哈格尔的挑衅言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在发表大会演讲时，即兴脱稿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



2014年5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宴会，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欢迎前来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的各国贵宾。

同盟国的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2014年4月底访问日本期间，明确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这是美国总统首次对此做出表述。在奥巴马到访菲律宾前几小时，两国签署了为期十年的军事基地协定，美国官方表示这是十年来美菲缔结的最重要的协定。在5月底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其主题

发言中点名批评中国，而日本则呼应美国的行为，安倍晋三表示日本将积极在地区内发挥影响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4月份将限制武器出口的原则修改为“武器转移三原则”，并于7月初通过了集体自卫权议案。而美国政府第一时间宣布支持日本的集体自卫权议案，动员日本参与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和主导地位。从这一点来看，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宣称美国要继续领导一百年的说法不过是政治宣传，离开了盟友的助力，美国安全体系将漏洞百出。

第五，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上升到新台阶。在亚信峰会期间，中国与俄罗斯签署的天然气协议备受国际社会瞩目。能源安全是该协议受到关注的一大因素，因亚信峰会接纳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卡塔尔成为成员国，进一步确保了亚洲能源市场的稳定性，但更重要的是地缘政治因素，因乌克兰危机，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极度恶化，美国出台措施制裁俄罗斯，对伊朗的核危机一直持高度戒备状态，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鲁哈尼出席亚信峰会，达成亚洲安全观，标志着美国以经济制裁改变地缘政治的企图落空。

针对美日同盟加强、中俄关系升温，国际社会提出一个问题：亚洲安全是否会进入新冷战格局？即以欧亚大陆的两大力量为基础的陆权对抗以太平洋两大力量为基础的海权。19世纪后期德国陆权的崛起与霸权国英国海权的对抗是国际关系史上的经典案例，也被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因。不过拿英德历史作为参考毕竟

是一种简单的经验主义，还必须有理论和现实的思考。显然，从亚信峰会的结果来看，多数亚洲国家赞成中国领导人提出来的亚洲安全观，即建立各国共享，以共同发展为目标的安全秩序。

二、亚洲安全观的历史方位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比较世界各种文明的发展后指出，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从来没有对其疆域以外表示过帝国主义野心，传统上就是一个大而不霸的国家。“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随着中国崛起，越来越多的观察家认为，亚洲的根本性安全问题是地区力量失衡，即如何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如何与强势中国共存是显著的挑战。这既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因为一战以后发展起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倾向于借用历史案例压制崛起国，认为崛起国通常并不满意守成国家对利益的分配，而守成国家往往不能适应新的利益调整。但历史并不是线性发展的，我们不能说历史上的欧洲安全秩序出了问题，今天的亚洲安全秩序也会重蹈覆辙；同时，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亚洲安全秩序，中国能否走出一条不同于过去 500 年西方崛起的新道路，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性题目。

如何理解中国在亚信峰会上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这种安全观与历史上构成亚洲安全架构的其他安全模式有什么不同？这既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与周边国家的传统关系中加以深究，更要从亚洲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加以推理。

首先，亚洲历史上存在过多个次区域体系，特别是近代东亚社会长期存在着朝贡秩序，它维持了东亚几百年的国家间和平，近年来其经验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种等级制的地区安全格局，以中国为核心，地区力量对比长期失衡，由于力量对比差距过大，长期缺乏区域内敌对势力，地区秩序总体上比较和平。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地区秩序的不足也非常显著，并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接纳地区外力量介入的机制。因此，当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进程中，以武力拓展海外市场、破坏东亚地区架构时，东亚国家无力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只能相继沦为殖民地。

其次，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在东亚和西欧有着不同的特征。在欧洲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多边的北约体系，这种安全体系有三个特点：第一，建立的前提是存在共同的外部威胁——苏联，这种威胁使欧洲国家被迫纳入美国设计的安全体系中，

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被转化为“家庭内部”的矛盾，可以通过其他利益交换来降低不安全感。第二，法国与德国的和解。两个陆权国家将军事力量约束在北约体系内，建立彼此间的安全互信。第三，经济文化层面的认同。欧洲一体化的基础还包括法国和德国共享战略性资源，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比较接近，人均收入差距较小，欧洲国家总体上属于同一个文化圈。

欧洲在安全问题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是有客观原因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德国愿意承认二战中的罪行，愿意达到和解妥协的结果。而亚洲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日本根本不承认二战罪行，甚至想翻案。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实现一体化？不是白日做梦吗？亚洲国家千差万别，有很发达的，有很落后的，领土也并没有连在一起，怎么实现一体化？现在东盟国家想推进一体化都行不通，因为它内部有矛盾。而且，欧盟也在反思，其一体化道路走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出现矛盾和问题了，下一步该怎么走还是个问题。欧债危机就是例证，各国的利益已经撮合不到一起了。虽然表面上看似是一体化，但是实际上它内部是分裂的。

冷战结束后，无论是经济还是安全领域，美国主导东亚地区秩序的特点相当明显，但也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东盟国家在维持东南亚的地区稳定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对维持地区稳定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六方会谈机制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就此而言，东亚的地区稳定是各国群策群力的结果。

三、中国崛起塑造亚洲安全秩序

2014年4月15日，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亚信最大的意义在于，亚洲各国认识到安全合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愿意共同向世界发出这样一个声音：亚洲事务应由亚洲主导解决，亚洲的安全首先应当也完全能够通过亚洲国家自身加强合作来实现。

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直接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而来的安全观念变革。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宣布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以和平与发展为外交政策的内核，不断调整自身的国家战略目标、国家身份定位来获得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通过融入地区一体化，提出安全观，以伙伴关系为核心构筑了一系列新的双边关系，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环境。

中国安全观念的创新首先是中国内部的需求，而不是对外扩张的需要。例

如，21世纪以来非传统安全研究在中国的飞速发展直接源于2003年的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中国在治理国内发展进程中不断更新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新认识，显然促进了亚信峰会上对综合安全的强调，所谓综合安全，就是“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中国充分认识到亚洲国家面临着大量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既包括像2004年印度洋海啸、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问题，也有像斯诺登事件揭露的网络安全，如何将大量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纳入各国政治议程，在双边和多边范围内加强磋商和应对，正是地区内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

中国在亚信峰会上提出的亚洲安全观，一方面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升华，另一方面也是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获得的经验。2014年6月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60周年纪念会上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中国不会颠覆现有国际秩序，也不会采用非法手段颠覆别国合法政权。同时，中国并不认同用“大家庭”“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方式处理国家间关系。这些观念直接得到印度、缅甸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局势发展则更加确定了中国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强调，这一点也反映在中国倡导的亚洲安全观中。实际上，对东亚国家而言，1997年的金融危机已经揭示出一个比较完善的地区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性，中国维持人民币不贬值政策为地区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加入WTO后，即与东盟国家创立自贸区，推进地区内经济关系的深度融合。2003年10月，中国成为第一个与东南亚国家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大国，有力地增强了双边政治互信，强化了安全合作关系，提升了中国周边环境的稳定性。



2014年7月9日，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在北京举行。

为了继续推进地区一体化、夯实地区安全的基础，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了“一带一路”方案，积极支持地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工程，在更大范围、更大产业规模上深化双边互利合作。在外交理念上，中国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提出了正确的义利观，告诫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要懂得处理

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关系，要懂得让利和分享。中国领导集体能够说服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支持新亚洲安全观，不仅让周边国家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也让周边国家从中国创新的安全理念中获得信心。

中国所提倡的亚洲安全观是一种基于共同发展的新型安全观，这种安全观不同于以均势为基础的安全观。均势安全观的核心内容是阻止一个挑战国，但以发展为基础的新型安全观强调国家的战略目标是动态和多元的，是不是霸权并不必然是国家战略的核心目标。其次，在看待本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新安全观强调共同性和可持续性，而不是简单的内外对立，绝对的安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

中国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得到了多数亚洲国家的积极响应，但也引来美日的担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在峰会上强调，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美国担心中国倡导的亚洲安全观具有排他性，不让美国发挥作用。众所周知，美国在其崛起过程中曾提出过类似的概念，即门罗主义，排斥欧洲国家介入美洲事务。而美国、日本作为亚信峰会的观察员国，没有参加峰会，美国对没有美国参加的亚洲安全机制建设充满警惕。实际上，亚洲国家在反抗欧美殖民的过程中也曾数次提出亚洲人主导自己的事务。1964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法国客人时也指出：“世界在变化，不是一两个大国所能管住的。各国人民应管各国人民的事情，不能允许任何外国人的干涉。”因此，要从历史角度理解中国提倡亚洲人主导亚洲事务，强调亚洲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自主性是亚洲国家获得的一项历史经验，主要是要排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全球化时代，亚洲国家同样也认识到，不可能独善其身，不能用孤立、排他的眼光看待安全问题。

四、亚洲安全机制建设的挑战

曾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独立智库学者何思文(英文名Stephen Harner)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办的“2014中国发展论坛”上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美国在亚洲的同盟体系代表了持续的军事霸权和统治，是权力的不平衡。美国应撤出日本，这样才能为中美之间的建设性互惠互利关系创造条件，并保持亚洲的稳定。”

亚洲安全观不同于历史上既有的安全秩序，中国也积极倡导亚洲新安全观，塑造新的亚洲安全秩序，赢得周边多数国家的赞誉，但也有一些分析人士对其未来发展前景表示担忧。例如，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主席斯蒂芬·哈德利认为，中国提倡的“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基本被解读为是将美国排除在亚洲安全结构之外。

亚洲安全观是地区安全机制建设的里程碑式倡议，但以亚洲安全观为基础的亚洲安全机制建设仍然面临不小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亚洲安全环境较为复杂。亚洲是五大洲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也是地缘政治环境较为复杂的。这里既有历史遗留问题，又有现实利益摩擦；既有领土权益争端，又有地缘政治博弈；既有亚洲一国自身和地区内部的问题，也有域外国家带来的影响。此外，冷战的坚冰在亚洲仍然没有完全融化，通过强化双边军事同盟寻求个别国家绝对安全的做法依然存在。第二，亚洲安全的新挑战不断出现。近年来，经济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十分突出。马航客机失联，搜救涉及域内外26个国家。近年来，各类流行病毒肆虐亚洲多国，造成大量生命财产损失。亚洲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张紧密的安全网，各国安全利益密切相连，一国在安全上出了问题，都会产生连锁效应，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需要明显上升。第三，亚洲安全机制建设仍显薄弱。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努力，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一系列安全合作机制逐步发展和完善。但总的看，亚洲安全合作机制总体水平还不高，安全合作还不够深入。一些国家搞排他性的小集团，各国安全互信有待加强。第四，亚洲安全合作理念有待进一步完善。亚洲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源地，也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新安全观的首倡地，这是亚洲对促进国际安全做出的重大贡献。同时也要看到，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思想在亚洲还有一定市场，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做法还时有出现，影响了亚洲安全合作的深入开展。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数据，在经贸合作方面，2013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达4436亿美元，与10年前相比翻了两番。目前我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在投资方面，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和东盟双边的累计投资额已经超过1100亿美元。

对中国而言，增强在亚洲安全机制建设中的作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中国

成为亚洲的主导市场，通过深度依赖加强利益协调和共生。中国已经成为周边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未来中国势必要成为亚洲国家的最重要出口目的地。但是这种模式的挑战在于，随着地区内国家经济分工的调整，往往大国并不占据生产链条中利润最高的部分，比如中国尽管是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国，但被中国人拿到的利润非常低，这个时候如何协调利益分配就成了挑战。此外，随着经济利益在地区分布越来越深入和广泛，中国势必要提供更多的安全公共品，与亚洲国家协同维护地区的稳定和开放。在这个方面，中国已经积累了经验，比如湄公河护航。

另一种是通过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在中美之间达成一项大交易获取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比如澳大利亚的休·怀特就认为，中国可以通过与美国分享权力获得在亚洲的地位。其实，这种想法没有考虑到，美国在亚洲享受到的超然地位，并非完全得自美国自身，如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区内同盟以及伙伴关系国的支持。就今天的亚洲事务而言，已经没有单独哪一个大国可以主导。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力量相对衰退，有的人为此叫好，但这是把双刃剑。一个返回本土、对国际事务缺乏责任的美国，有可能给地区经济融合造成重大打击。为此，积极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是建设新安全机制的重要内容，要把处理对美国的关系同创立亚洲安全新机制联系在一起，积极利用美国在该地区的历史遗产，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确保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新格局的最大保障，是积极稳步推进中国两个一百年战略。中国在推进与周边国家的新关系时，内外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到2021年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包括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初步完成，以及2049年实现人均收入的中等国家化。目前的亚洲地缘政治经济变化只是这一长远目标的一个阶段，具有动态特性。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

延伸阅读篇目推荐：

《专家解析亚洲安全观提出背景及深刻内涵》，《法制日报》2014年5月22日。

《亚洲需要什么样的新安全观？》，《国际先驱导报》2014年5月18日。

《外交部部长王毅谈“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人民网网站2014年3月8日。

思考题：

- 1.如何看待当前亚洲的安全形势，呈现出哪些特点？
- 2.怎么样理解中国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如何才能建成亚洲安全的新机制？